

郭良平) 专栏

崛起的只能是普世大国

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对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，只有美国能够承担起领导世界的重任；英国不行的原因，不仅只是国力不够，也没有这种高度，因为英国是历史的产物，而美国是建立在哲理的基础上的。撒切尔夫人当时是在怂恿老布什出兵伊拉克。但是，她的话并非全无道理。

大国崛起含义变了

英国崛起靠的是海盜来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。希特勒的“光荣与梦想”是横扫欧洲，清空“劣等民族”来为德意志上等人开辟“生存空间”。日本占领东北后，派遣了大批开拓团，说是这么肥沃的土地，中国人不配占有，理由由大和民族占为家园。成吉思汗和蒙古铁骑依靠的是屠城的恐惧来征服，这在现代只有核武器能相比。

实力不是无用，但在当今世界，它的效果大打折扣。胡塞武装一点也不怕美国航母，索马里海盜也没有被各国护航的军舰吓退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思路基本还停留在沙皇大俄罗斯时代，只看重实力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，以为几个星期就能解决问题，结果两年多了，死伤数十万人后战争结束仍遥遥无期，并且遭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制裁，没有数十年很难恢复。二战和冷战后出现一大批袖珍小国，按旧时的实力原则它们不应该存在，存在了也活不长。

但现在它们活得悠哉游哉，而且在联合国都有一票。这个世道在变。明目张胆灭人之国行不通了。普京那种什么都不如“轰炸机编几下翅膀”的逻辑，听起来有道理，实行起来举步维艰。新形成的国际社会有强大舆论压力。大国崛起的含义变了，成了“被广泛接受”的同义词。

美国的经验教训

美国要成为“山巅上的城池”的立国理念，使它既办了好事，也办了坏事。起初，除了孤立主义外，它行事同老牌殖民帝国无异，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与西班牙夺取殖民地的战争，视拉丁美洲为后院，将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排挤出等。

但随着国力强大起来，产自立国理念的政策和行为逐渐多起来，最终使美国成为一个不同以往的霸权国。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起了关键作用，并且两次都同中国站同一条战线上。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罗斯福总统用石油、钢铁等战略物质禁运来逼日本从中国撤兵。二战中，美国是唯一在物质上支援中国的大国。战后非殖民化中，美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包括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，逼迫老牌殖民帝国放弃殖民地，如逼迫荷兰放弃印度尼西亚，美国也自愿让它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独立。

第二次伊拉克战争，用普通人的逻辑来看，美国是为了石油而出兵。但这得不偿失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后重建反而是中国公司获利；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等人的计算，光伊拉克战争就消耗美国3万亿美元（约3.86万亿新元），并且因阵亡者的抚恤、伤病退伍军人的开销和其他善后措施，以后还会不断增长。这笔钱完全可以将国内基础设施翻新提高。所以，美国的伊战决策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理念的影响。

越南在抗美战争中牺牲巨大，但到越南走走就会发现，那里很少有反美情绪，反而对中国这个主要援助国敌意甚深。这有国家战略的因素，但在民间对美的好感，不能不说同美国“哲理立国”因而透明真诚有关，毕竟在越战中，美国是“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”。它的对象是哲理上的“红祸”，而真正交手的却是越南顽强的民族主义。纵观世界历史，只有美国满世界管闲事，出力不讨好，反而削弱自己。这种对事不对人（当然，对事过程中也妖魔化不少人/国家，但这是必要手段）的方式公开透明，其他国家觉得容易应对。

开放式文明大国

可以说，美国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国际行为标准和秩序，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受益匪浅。它先辉煌后受挫，遭到许多它干预的国家嫉恨，说明它的立国理念虽高大上，但只在西方文明圈中成功，用到世界别处就遭遇到一系列困难，甚至走向反面，现在甚至在西方也受到质疑。这为第二次哲理大国的崛起提供机会。但美国之后，只有比美国做得更好更普世的大国，方能被广泛接受，因而崛起的只能是另一个哲理大国。

比较英美同质文明下的霸权更替，异质文明的大国崛起要比同质文明中大国更替，对世界的冲击要大得多，也困

中华文化有优点也有糟粕，在弘扬优点时也应对照糟粕进行批判，否则它会随着优点的扩展而悄悄地重新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。

难得多，而且没有成功先例。作为近代史上首个异质文明大国的崛起，中国决心走出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。有一段时间，西方国家主张将中国作为“利益攸关”的大国纳入世界秩序，而中国也以“负责任大国”身份参与国际事务。但这种良好的势头戛然而止，急转直下，俨然形成对立的形势。

这里可以用传统理论来解释：一方面没有任何大国对自己被超越无动于衷，趁着力量还在，努力打压遏制乃人之常情，但另一方面是个接受问题。同日本对西方亦步亦趋相反，中国强调“道路自信，理论自信，制度自信，文化自信”，并且已经在推行“新型国际关系”和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全面主张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和人类前途，引起西方和其他既得利益国家的警惕和对抗是必然的。

然而中国自己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也无法预料，并且也不是中国一国能够决定的。这至少说明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有疑忌、不认可、不接受。异质文明大国本来就容易引人误解和侧目，须要大量引入世界各种文化文明的优点来提高自己的水平，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接受，这也是超越美国唯一的途径。中国的困难是它在文明和意识形态上都有些先天不足。

中国软实力先天不足

随着逐渐强盛，中国也必然会像美国那样逐步走向普世大国。中国有良好的愿望，却理论准备不足，必须在某些方面的普世上“恶补”，而不能让“四个自信”先入为主，导致故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。中国在吸引力或软实力上的先天不足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意识形态：无可否认，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已经在国际上小众化了，而且因为它的阶级斗争、无产阶级专政等理念，以及在前共产党国家的实践中出了很大问题、走向反面，因而名声普遍不好，所以今后也很难大众化。它在维护一党统治上也许有用，但在国际上是个负资产，在中国老百姓甚至许多中共党员中也是虚无缥缈，在管理市场经济、推动发展上鲜有指导意义，反而常常起副作用，比如吓跑不少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”——企业家，高端人才等。在政治上，近些年的大规模左转是中西关系断裂的一个重要因素——许多西方人物声称绝不愿意生活在共产党主导的国际秩序下。

历史上，中国的宿命是“独善其身”，现在要“兼济天下”有些勉为其难，是逆文化本性的。但相比之下，中华文明更加和平与包容，但中国的历史大传统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视野主要向内，以自我中心来考虑天下大事，这就把许许多多的外国人排除在外，久而久之，形成“天朝大国”的盲目的自我观念、心态和思想方法。这个特点在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时，有了很大改变，爱国的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地专研西学以救国救亡。

但中国一旦强大起来，这种心态很自然就回转过来，比如机场和地铁等地方的标识上去掉英文——一点也没有意识到，这些年在国外这些地方正在大量采用中文。再比如，许多中国学者又在尝试传统同化异族战略，大力鼓吹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优势，以及未来世界的中国中心论。盲目的文明优越感，借力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，有可能重新封闭脑洞。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也造成外部的大气候不利中国。好在政府领导人很清醒，意识到这个危险，采取措施扩大开放，甚至不惜单边开放。西方自由主义和现代化是一对孪生子，只要搞现代化，就必须撤开自由主义，就必须吸收自由主义的许多普世优点。

两者都说明，中国尚未能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普世哲理和价值体系。中国并非没有条件和能力来建立这个体系。比如在不少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在非洲大陆，中国的政策及背后理念和价值观，在许多情况下比西方自由主义更得民心。这说明中国已经掌握一些普世的东西，只须要总结、提高、系统化。但这必须克服上述先天不足。大胆解放思想的话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——连朝鲜都把马克思主义从官方主体思想中剔除了。劳动党和政权依然稳固。中华文化有优点也有糟粕，在弘扬优点时也应对照糟粕进行批判，否则它会随着优点的扩展而悄悄地重新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。这方面毛泽东时代做得很彻底，尽管过头了。

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，是一旦美国的对比国力下降到一定程度，就会被废气充斥，在行为上变成一个自私贪婪的普通国家——在前总统特朗普治下尤为明显。这对两国和世界都不利，战争的危险会大大上升。努力同美国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至为重要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